

朱子讲历史之八：《诗经·二南》中的文王教化

张元

(台湾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, 中国台湾 新竹)

[关键词] 朱子讲历史 《诗经·二南》 文化教化

[中图分类号] K24 [文献标识码] C [文章编号] 0457-6241(2006)10-0050-04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写成白话，就是：“关关和鸣的雎鸠，并栖黄河的沙洲。娴静美丽的姑娘，是公子的好配偶。”（吴宏一语译）这是《诗经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的第一章，也是受过教育的国人都能琅琅上口的诗句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汉代的儒者多从政教的观点立论，有的说它是赞美文王的教化、后妃的美德；有的说是讽刺康王好色晏起，不上早朝，具有劝诫的意思。宋代以来，开始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祝福贵族新婚的诗歌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情歌，描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。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宋人看《诗经》和汉人已有很大的不同，似乎已经从政教的训诲，转变成成为爱情的歌咏。朱子是宋代大儒，他怎么看《诗经》呢？

政教训诲与爱情歌咏

朱子说，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是庶民所作，“雅”是朝廷的诗，是士大夫所作，而“颂”则是宗庙的诗。同时代的郑樵也是这么说，朱子同意他的意见，也赞同郑樵不信《诗序》的看法。《诗序》是每首诗的前面，汉儒所作的说明。有一次，朱子在课堂上对学生说：“我从二十岁读《诗》，就觉得《小序》没有意义，不管《小序》，只是玩味《诗》中的词句，却又觉得道理贯彻。那时候，我也问过乡里的先生，他们都说《序》不可不读，而我的疑惑始终不能释怀。到了三十岁，断然知道《小序》是汉儒所作，错误荒谬，是数不清的。”此外，朱子谈及他撰写关于《诗经》著作时，也有同样的经验。他对学生说：“我过去写《诗解》，最初用《小序》，解不通也要硬掰。后来觉得这样不行，第二次解说，有时不采《小序》的说法，然而还是不见诗人本意。最后明白了，

【收稿日期】2006-07-15

只有完全不管《小序》，就可以解得通了。”从朱子的态度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他是不赞同汉人那种对《诗经》的刻板看法的。朱子同时的大学者，也是好朋友吕祖谦，在《诗经》方面下过很大的工夫，所写的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，朱子很推重，在《诗集传》里引用很多。吕祖谦相信《诗序》，在这一点上，朱子与他的意见很不相同。相信《诗序》与不相信它，在解《诗》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差异呢？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《郑风》的《狡童》首章：“彼狡童兮，不与我言兮。维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。”（“小伙子啊太狡猾，不肯和我再说话。为了你啊为了你，害我饭都吃不下。”程俊英语译。）《诗序》说：“刺忽也，不能与贤人图事，权臣擅命也。”意思是讽刺郑忽，不能与贤人共事，而让权臣祭仲专擅国政。但是这位郑忽又与“狡童”有何关系？朱子怎么看都看不出来，就诗的本意读来，明明是一个女子戏弄男子的口吻。朱子在《诗集传》中的解释为：“此亦淫女见绝而戏人之词。言悦己者众，子虽见绝，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。”朱子的另一个理由是圣人所说的“郑声淫”，“狡童”就是一个例子。吕祖谦不赞成，不认为是淫奔的诗，不是淫奔的人写的。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李茂钦就问：“老师，您与吕东莱先生辩论淫奔诗的问题，吕先生说这些诗是诗人所作，您说是淫奔的人所作，我到今天还没弄清楚，能不能请老师再说明一下。”朱子说：“如果是诗人为了讽刺淫奔而写，则吕东莱他家乡婺州如果有人淫奔，吕先生为什么不作一首诗讽刺一番？”李茂钦又问起别的事，朱子说：“等一等，你不要讲别的事，你先回答我刚刚问你的问题。”李茂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愣在那里。朱子说：“若是别人有隐僻的事，就做诗讽刺，就是今天所说的轻薄子，好作这种戏谑言词的人，乡里不会喜欢，诗人温厚淳良，必然不会作这种事。《诗》中有好的，

有不好的,圣人都保存下来,我们看了,就懂得劝善去恶,知所进退了。我们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,读到这一段课堂实录,还可以感到朱子对于《诗序》问题的态度,是非常认真严肃的。

朱子把《诗经》都看作是反映社会、歌颂爱情的篇章了吗?却又不是,《诗经》中的教化功能,朱子仍然重视。就以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部分来说,朱子就将“二南”,也就是《国风》中最前面的两篇:周南与召南,与其他的篇章分开。朱子在其所著《诗集传》的序中,明白写道:“我听说,诗中被称为风的那些篇章,大多出于民间的里巷歌谣,就是男女之间表达感情的歌咏。唯有周南、召南,由于受到文王的教化,风俗淳良,人人表现出性情中最好的地方。所以,其中的诗篇,欢快而不过分,哀叹而不悲伤,这两篇就成了风诗中的正经。而自邶以下的十三国风,其国有治有乱,其人有贤有不肖,所以发于诗歌,就有邪正的不同,对于先王的正风来说,就有了变化了。”朱子提到了正风与变风,他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,在这本《诗集传》全书的开头地方,朱子写道:“我们所说的国,是诸侯的领地,所说的风,就是民俗歌谣的诗。说它是风,因为导人向上的言词,足以感动人心,就像风吹起来,呜呜作响,足以感动万物。因之,诸侯采诗贡于天子,天子把它们列于乐官,藉考察习俗的好坏,知道施政的得失。过去人们把‘二南’看作正风,显示出家族、邻里、乡党、国家以至于天下,都是教化大行,风俗淳美。十三国为变风,诗篇也列于乐官,许多都可以发挥诫鉴的功效。”朱子怎么借着《诗经·二南》的诗篇来说“家族、邻里、乡党、国家以至于天下,都是教化大行,风俗淳美。”呢?让我们来看看《诗集传》中,二南的若干诗篇,朱子是怎么说的。

朱子对二南诗篇的解说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”(“茂盛桃树嫩枝,开着鲜艳粉红花。这位姑娘要出嫁,和顺对待您夫家。”桃夭首章,程俊英语译。)这是一首讲婚姻的诗,年轻的男女,要成家了,要在一个家中和顺地过的日子了。朱子解这首诗,着重之处有二,一是男子和女子正是适合结婚的年龄,就成家了,就是“婚姻以时”;二是嫁过来的女子,十分贤能,一定可以把家庭照顾得很好。天下国家的大治,从一个家庭的开始,而家庭则从婚姻开始。所以,这首诗不能只看成是一首贺新娘的诗,而应

有其深义。

“肃肃兔置,椽之丁丁。越越武夫,公侯干城。”(“繁密整齐大兔网,丁丁打桩张地上。武士英姿雄越越,公侯卫国好屏障。”兔置首章,程俊英语译。)这首诗是诗人在路上看见英姿威武的猎人,正在打椿张网,准备捕兔。想到这些猎人,看来很有能力,希望他们被选为保卫家国的武士。朱子在解说完了诗中的文字之后,说道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地方上贤能的人很是不少,地方上何以会有这么多的贤能人才,这岂不是反映了文王教化的效果吗?

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”(“车前子哟采呀采,快点把它采些来。车前子哟采呀采,快点把它采得来。”芣苢首章,程俊英语译。)这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,随口唱的短歌。朱子怎么说呢?他说从这首妇女们在采车前子时,随口唱的歌中,可以想见那是一个安定、和谐的社会,她们清闲无事,大伙一起,采着车前子,唱着歌,流露出心中的欢愉,也展现了文王施政,教化大行,风俗淳美的成果。至于,车前子是用来做什么的?朱子也问了这个问题,只是没有确切的答案。朱子说,不知道采来做什么用,有一种说法,那可以用来治难产。

“鲂鱼赀尾,王室如毁。虽则如毁,父母孔迩。”(“鲂鱼红尾为疲劳,官家虐政像火烧。虽然虐政像火烧,爹娘很近莫忘掉。”汝坟末章,程俊英语译。)这四句话是说,诗人设想丈夫回家之后,怎么劝他不要再去服役。朱子想像文王的时代,三分天下已有其二,但仍然服事商纣,人们还是要为商纣服役。他的家人就会说,你是如此勤苦,但商王的统治,又是如此酷烈,心中怎能不怨呢?然而,尽管商王十分残暴,文王的恩德,却如同父母照顾子女一般,就在不远的身旁,所以也就忘掉了服役的劳苦了。这里可以看出来,文王德泽之深厚,当时风俗之淳美。朱子说,另一种说法是,父母就在身旁,服役的人不可以懈怠王事,让父母感到忧心,这种说法,也讲得通。

“维鹊有巢,维鸠居之。之子于归,百两御之。”(“喜鹊树上把窝搭,八哥来住它的家。这位姑娘要出嫁,百辆车来接她。”鹊巢首章,程俊英语译。)这是《召南》的第一篇,也是一首歌颂新娘的诗。朱子说,南国的诸侯,受到文王的教化,能够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,就是当地的女子,也受到后妃的感化,表现出专静纯一的美德。所以,嫁到诸侯的时候,夫家的人很是称美,用了一百辆车来迎

娶。这里朱子讲的是教化大行之后，人们德行之高与风俗之美。

“野有死麋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……舒而脱脱兮，无感我兮，无使龙也吠。”（“郊外有一只诱鹿，洁白茅草包裹她。有位姑娘动春心，俊美青年引诱她。……缓缓而又轻轻哟，不要扯我佩巾哟，不要让狗呀乱叫！”野有死麋 首章与末章，吴宏一语译。）今天的学者认为，这首诗写的是一位猎人在丛林里遇见一位少女，就把猎来的小鹿和砍来的木柴，用白茅包好，作为礼物，终于获得了爱情。朱子说，南国受到文王的教化，女子都知贞洁自守，能抵挡外人的诱惑，诗人特别加以赞美。后面的一章，是女子拒绝男子诱惑的话语，她慢慢地说，不要动我的头巾，不要惊吓了我的小狗，讲得十分明确，呈现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。朱子的解释，与今天学者认为，这是对于爱情的动人描述，显然很不一样。

“何彼襁矣，唐棣之华。易不肃雝，王姬之车。”（“怎么那样地浓艳漂亮？个唐棣花儿一样。怎么气氛欠肃穆安详？王姬出嫁的车辆。”何彼浓矣 首章，程俊英语译。）这是描写贵族女子出嫁，车辆服饰侈丽的诗。朱子说，王姬下嫁于诸侯，车辆、服饰十分漂亮，然而却不以出身王室而骄其夫家。看到她的车子，知道她很谨慎，能做好妇人该做的事，于是做诗称赞：那样如锦如簇，是唐棣的花，这样的雅丽端正，是王姬的车。这一定是武王以后的诗，哪一个王就不知道了。然而，文王、太姒的教化，历久不衰，于此处可以见到。

诗教有益世道人心

我们读朱子对于周南和召南的解说，是不是感到和诗的原意相去颇远呢？我们明明看到的是新娘子，是猎人，是唱歌的女子，是服役远地的征夫，是恋爱中的男女，但朱子却一再地提到文王，提到太姒，告诉我们那是一的美好风俗的呈现，是教化大行的成果。这不是和我们读的是“狡童”，他们说的却是郑忽，颇为相似吗？为什么在二南中的诗篇，就要与其他的十三国风，有着如此不同的处理呢？其实朱子也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缘由，因为《诗经》不只是文学作品，同时也是经学著作，有着教化上的重大任务。朱子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上看，歌谣的性质十分明显，所以他不能同意汉儒的解诗，就是好友吕祖谦的意见，他也不赞同。但另一

方面，如果完全从作品的本身来看，它的教化作用不只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不复存在，怎么办呢？看来是非有点妥协不可的，二南就是朱子妥协折中的地方。

在课堂上，学生问：“程夫子说：‘《诗》有二南，犹《易》有乾坤。’是不是因为二南中的教化深，而其他地方的教化浅？”朱子说：“不对”。学生又问：“那是不是因为二南讲的是王，其他讲的是诸侯？”朱子说：“今天我们只要看看大序中所说的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大序说：‘关雎，麟趾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；鹊巢，駉虞之德，诸侯之风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’我们只要看那个‘化’字与‘德’字，以及‘所以教’字，便可以看到二南和乾坤是很像的。”这一段对答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讯息。第一，朱子赞同程子对二南的看法，认为它的地位如同《易经》中的乾、坤二卦，有其指针性的意义；第二，朱子对大序和小序的态度并不一样，他不认为大序很好，但可接受，而小序则是问题很多，绝大多数不能同意。按：大序是指整卷前面的“序”，而小序则是每首诗前面的“序”。第三，朱子要学生注意的是几个关键字，如“化”、“德”、“所以教”等，表示这几个字指出了理解诗义的方向，而这几个字都是直指人的内心，都与教化有关。看来朱子对于汉人的解诗，也不是如同今天之全然反对。

学生又问：“二南诗篇，真的可以用来教化天下吗？”朱子回答：“我们不要问，是要教化天下，还是不要教化天下，这样的问题；而是要从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’等等诗句看到里面去，看里面的道理是什么。今天人读书，只是向外面问有用没用，对于本文却都去不真切了解。”朱子的回答，看来好像规避了问题，其实却提出了重要的看法，一是读书要读到本文的里面，不要只想外在的效果；二是所谓本文的里面，就是一番道理，也就是义理所在，这是要读者应该用心理解体悟的。

那么，二南的诗篇，读者可以理解体悟到什么呢？朱子在《诗集传》的关雎中说道：“孔子曰：关雎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这就是说，这首诗可以用性情之正，声气之和来说明。从后妃之德以及其他的描述，可以见到性情的全体，虽然声气之和不容易见到，但是，只要学者熟读诗中的词句，体会其中的义理，对于我们的心性修养，可以大有裨益，这也是我们学《诗》的本原所在。”从这一段朱子的话语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读《诗》的本原，在于心性修

养。这种论述的重点与方式,展现了宋儒论学的特色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,在朱子看来,都是民间的歌谣,但是这些民间的歌谣却也反映了社会的风俗,而社会的风俗则是从正心、诚意、修身做起,经历齐家、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。《诗经》的《二南》则是全书的纲领,藉文王的教化提出了理想的目标,也可以说是指示了努力的方向。

朱子的《诗集传》与《四书集注》《易本义》,元代以后都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单。我想要问的是:读书人把这些书读得烂熟,固然是为了功名利禄,但是,这些书中的道理对于一代又一代,不计其数的读书人,一点影响都没有吗?这些书中的道理,对于无数读书人立身处世的人生态度,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作用吗?我认为,影响与作用,多多少少,一定是有的。我相信只读知识堆积,但全无义理的书,绝对不会比读这些讲道理的书,有益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以及社会的风俗淳厚。

附 钱穆对《诗经》的看法

我们看来,朱子还是受到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,似乎未能完全展现《诗经》国风中民间歌谣的面貌。我们会想,今天讲《诗经》,大概都从文学的角度着眼,不再谈教化的功用了吧。其实不然,南宋历史学家马端临,在其所著《文献通考》中,撰一长论,不同意朱子对《诗序》的看法。马端临认为,《书序》可废,而《诗序》不可废,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序可废,《十五国风》之序不可废。理由是国风的体例是用一种假借的方式,说了很多,写了很多,但作者的意旨,一句都未提及,需要用《序》的方式来说明。就以朱子所说的淫奔之人所作之诗,春秋时代之正式场合亦见到应用,所以这些诗的意旨,必然另有所指,不应该如朱子之所说。钱穆先生撰《读诗经》一文,提及马氏所论,并说:“今按马氏之说,事证明晰,殆难否认。”就以淫奔诗来说,朱子主张某些是淫奔之女子所作,如前述《狡童》,皮锡瑞的《诗经通论》提出了反驳,说朱子误以比、兴为直接铺陈的赋,以致弄错了。钱先生也认为“皮氏此论,可谓深允。”钱穆先生,这位深受朱子学术影响的现代史学大师,怎么看朱子讲《诗经》呢?我们从前面的这两个例子,大概可以猜测,钱先生是不赞同朱子讲法的。我们不妨摘选钱先生《读诗经》长文中的三个片段,看看钱先生对《诗经》的主要观点,作为本文的结束。

“《诗经》乃古代王官之学,为当时治天下之具,则其书必与周公有关,必然与周公之制礼作乐有关,必然与西周初期政治上之大措施有关,此为讨论《诗经》所宜首先决定之第一义。……实则《诗经》创自周公,本属古人之定论;历古相传之旧说。其列指某诗某篇为周公作者,亦甚不少。其间宜有虽非周公亲作,而秉周公之意为之者,欲求深明古诗真相,必由此处着眼。惜乎后人入之愈深,求之愈细,篇篇而论、句句而说、字字而详,而转于此大纲领所在,放置一旁,于是异说遂滋,流漫益远,而诗之大义愈荒,此所不得不特为提出也。”

“《诗三百》,彻头彻尾皆成于当时之贵族阶层。先在中央王室,流衍而至于列国君卿大夫之手。又其诗多于当时之政治场合中有其实际之应用。虽因于世运之隆污,政局之治乱,而其诗之内容风格,有不免随之而为变者;然要之诗之与政,双方有其不可分离之关系。故《诗三百》在当时,被目为王官之学;其传及后世,被列为五经之一,其主要意义乃在此。此则无论如何,所不当漫忽或否认之一重要事实也。”

“《诗三百》,本都是一种甚深美之文学作品也。惟周公运此种深美之文学作品于政治,孔子又转用之于教育,遂使后人不敢仅以文学目《诗经》。抑且循此以下,纵使其被认为一种极精美之文学作品,亦必仍求其能与政教有关,亦必仍求其能对政教有用。此一要求,遂成为此下中国文学史上一传统观念。而此项观念,则正汲汲源于《诗三百》。知乎此,则无怪《诗经》之永为后代文人所仰慕师法,而奉以为历久不凋之文学鼻祖矣。”

看来,从《诗经》谈历史,真是非常复杂,不可一概而论。

本文引用资料,除《诗集传》外,有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、八十一;程俊英、蒋见元着《诗经注析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91);程俊英译注《诗经译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);吴宏一编着《诗辞歌赋》(台北:桂冠图书公司,1998);以及钱穆着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(一)》(台北:东大图书公司,1976)等。

(本文已刊载于台北《历史月刊》第222期,2006年7月号)

【作者简介】张元(1943-),男,河北广宗人,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,主要从事宋史及历史教学研究。

【责任编辑】蔡世华